

中国近现代 国情问题剖析

朱育和 杨洪波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国情问题剖析

朱育和 杨洪波 主编

DH127 E3

清华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对中国近现代史上的 10 个重要问题进行了评析,如:对传统文化的评价;帝国主义侵华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必然性;多党政治尝试与夭折;农民土地问题;国共两党之得失;中国现代化道路;“文化大革命”与“北京风波”等。这些是 1978 年以来史学界、理论界争论的热点且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问题。本书可帮助读者了解我国近现代的国情,以认识现实、把握未来。适合干部、青年阅读,也可作为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的辅助教材。

中国近现代国情问题剖析

朱育和 杨洪波 主编

☆

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 清华园

清华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科技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字数: 284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ISBN 7-302-00867-1/O·9

定价: 3.35 元

前 言

中共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国情教育,使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地认识国情。这对我们今天的青年学生来说,尤有必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针的教育,决不能脱离国情教育。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针是由国情决定的。对青年学生进行国情教育,才能增强青年学生对一些理论问题、社会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的判断力和免疫力。因此有必要编写一本有关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国情参考书。

另外,我们在近些年的中国革命史教学过程中,感觉到有些问题在教材里不可能展开论述,有些必要的参考资料,教材不可能容纳。特别是在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时,更需要一本可以帮助学生开阔视野、开拓思路、深入分析问题的参考书。

基于以上考虑,我们组织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的教师,编写了本书,献给大学生和青年朋友。

本书针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就1978年以来在史学界、理论界争论热点及中国近现代革命史重点且对青年学生影响较大的十个问题进行评析。我们力求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述。但是,要达到这样要求,并非易事。书中难免尚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指正。

本书附录部分收入了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对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问题的论述,也收入了陈独秀、王明、张君勱、蒋介石等人的

文章。正确与错误的观点一并酌收，旨在为青年学生提供一些可资讨论的资料。另外，还附有“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不平等条约”等八篇介绍性材料。

本书由朱育和、杨洪波主持编写。参加编写的同志具体分工是：

正文部分：朱育和：“评文化反思中的虚无主义思潮”；杨洪波：“友谊还是侵略”；蔡乐苏：“碰撞中的选择”；王奇：“中国历史上多党政治的尝试与夭折”；董群：“农民土地问题纵横谈”；彭兴惠：“顺民心者昌”；高敦复、金丽华：“失民心者亡”；鲍振芬、欧阳军喜：“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沈培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的四十年”、“从十年‘文化大革命’到五十天‘北京风波’”。

附录部分：郑小筠：“火烧圆明园”；鲍振芬：“沙皇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吞”；夏宝兴：“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不平等条约”；蔡乐苏：“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杨洪波：“北洋军阀与北洋政府”、“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民主革命时期的三个纲领”。蔡乐苏、王宪明收集整理了毛泽东、邓小平等关于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等论述，以及陈独秀、王明等人的文章。

全书最后由朱育和、杨洪波审阅、修改、定稿。

我们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吸收了史学界专家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并得到清华大学出版社高云鹏同志的大力协助，在此谨致谢忱。

编 者

1990年9月

目 录

前言

一、评文化反思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	1
二、友谊还是侵略	42
三、碰撞中的选择	
——西方文化危机对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	
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61
四、中国历史上多党政治的尝试与夭折	87
五、农民土地问题纵横谈	
——中国共产党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探索和	
贡献	109
六、顺民心者昌	
——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人民得天下的	146
七、失民心者亡	
——国民党何以在大陆上失败	163
八、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78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光辉的四十年	196
十、从十年“文化大革命”到五十天“北京风波”	218

附录

1. 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部分论述	240
---------------------------	-----

2. 邓小平同志关于当代中国的部分论述	261
3. 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279
4. 方志敏《可爱的中国》(节录)	281
5.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	287
6. 王明关于中国革命的言论摘录	295
7. 张君勱《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	298
8. 蒋介石的新年文告	301
9. 火烧圆明园	304
10. 沙皇俄国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吞	308
11. 中国近代史上的若干不平等条约	312
12. 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	323
13. 北洋军阀与北洋政府	326
14. 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根据地	330
15.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	335
16. 民主革命时期的三个纲领	340

一、评文化反思中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

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发达国家中经常泛滥的一种社会思潮。近些年来它在中国也特别时髦,而且很容易迷惑思想单纯的青年朋友。虚无主义这个名词是从德文意译过来的。民族虚无主义,指的是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本民族的文化,甚至否定自己一切的态度或思想倾向。接受这种思想影响的青年人,要么看破红尘,悲观厌世,要么彻底反传统,盲目地破坏一切。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散布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人,是在“文化反思”下做文章的。他们打着“文化反思”的旗号,彻底反传统,否定本民族的一切,鼓吹全盘西化。因此,要了解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弄清它的危害,明辩其是非,把“文化反思”作为一个历史课题研究,进行“文化反思”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做了,才能了解这次文化反思是怎样发展到集民族虚无主义大成的《河殇》热的;才能懂得近代中国出现民族虚无主义思潮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历史根源的;才能认清它对中华民族的危害;才能懂得正确的文化反思应有的态度。总之,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在更深的层次上批判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真正树立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一)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反思发展轨迹, 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

文化反思是近代,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的热门话题。在介绍最近

这次文化反思发展的轨迹之前,先简单解释一下“文化反思”的词意,以便讨论问题时有一个统一的出发点。

所谓“文化”,从大家反思的内容看,指的是广义文化。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方面的广泛的内容。“反思”,是近代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的属于认识范畴的一个概念,从德文 Nachdenken 和英文 Reflection 意译成中文。在旧哲学中,这个名词是唯心主义的角度来说明人的认识活动。17 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把离开感觉形成内部经验的心灵活动,称为“反思”。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专用此词指对思想本身进行反复的思索,即指思想的自我运动。中国古代与“反思”相对应的名词是“反观”,它是北宋邵雍语,指人的认识不必外求,只要反观自身便可知晓一切的意思。可见,“反思”不含有“检讨”、“反省”的意义。了解了“反思”的本意之后,我们便可知道目前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反思”,不是原来意义的“反思”,而是一个含有“检讨”、“反省”、“省察”、“鉴戒”等词义的新名词,并且这种用法已得到社会的认同。为了尊重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决定也从新的意义上使用“反思”这个名词。

最近这一次文化反思是从 1978 年开始到现在尚未结束,已经进行了 12 年。《河殇》热的出现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争论,达到了这次文化反思的高潮。它是在“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造成了人们心灵上巨大创伤,而我们又实行了改革开放新政策的背景下发生的。1949 年,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新中国的头七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过严重的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但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打开了国门,在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比中,发现原有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

人们为中国的落后而痛苦，一种失落感油然而生。这样，就具备了产生规模空前的文化反思的基础。

这次文化反思，是从政治上对历时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浩劫进行反思开始的，主要表现在控诉性的“伤痕文学”作品之中。这些作品，从剖析“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乃至到“四人帮”被粉碎后继续存在的某些社会现象入手，揭露林彪、“四人帮”假革命的反革命本质，启迪人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但是，“伤痕文学”作品显得视野过于狭窄，于是随着对“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历史渊源的探究，出现了“反思文学”作品。它的历史跨度已不局限于“文革”的十年，而是长达数十年，对劳动群众命运和知识分子命运的反思，是“反思文学”作品的两大题材。前者是着重于对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遭到破坏的反思，描绘出人民群众在“左”倾路线下的艰难生活；后者是着重于对知识分子在“左”倾路线下被歧视、被践踏的曲折历程的反思。“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于纠正“左”的错误，拨乱反正，作出了贡献。但是，两者都存在着过多地，甚至彻底地否定过去的片面性。这种缺点，为后来文化反思中的虚无主义作了铺垫。

1984、1985年后，在文学创作中开始出现“寻根”热；使“文化寻根”作品风行一时。过不久，又出现了“问题报告文学”热。这一类作品，苏晓康最为活跃。短短几年中，他先后发表了《东方佛雕》、《阴阳大裂变》、《人生长恨水长东》、《沉思在文明暮色中的哲人——李泽厚剪影》、《最后的古都》、《洪荒启示录》、《自由备忘录》、《“乌托邦”祭》、《活狱——关于我们心灵的报告》等大部头“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片面地“写阴暗面”，偏激地“干预生活”，丑化现实。富于煽动性，制造思想混乱，给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在一些有影响的大报和刊物上，开始了中西方化对比的大讨论。讨论中，有人公开提出“要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他们对中国的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中国五千年文化传统骂

得一钱不值，偏激之程度超过 30 年代“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为了说明问题的严重，我们把刊登在当时报刊上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点（有一些不注出处）摘录几条如下：

“通观几千年中国的历史，实在是一部灾难迭起的周期性的政治危机史。”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宗法为经，以封建为纬”的“封闭性的文化”，“中世纪的文化”，“人类动物学的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习惯于盼救星的民族。我们的心理是盼救星的心理，我们的文学是呼唤救星的文学。”“社会进步到今日，传统的救星是救不了我们了。”

“中国传统文化好比是一块带毒的蛋糕。”

“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表现在许多领域之中：

（1）建立网络型社会结构的要求同传统文化中大一统观念的冲突；

（2）贯穿于网络型社会结构之中的平等原则同中国传统文化中贵贱等级原则的冲突；

（3）法治要求和人治传统的冲突；

（4）现代民主制度与家长宗法观念的冲突；

（5）个性的全面发展与共性至上的群体原则的冲突；

（6）创造要求和保守心理的冲突；

（7）开放和封闭的矛盾冲突；

（8）竞争与中庸信条的矛盾冲突；

（9）物质利益原则与伦理中心原则的矛盾和冲突；

（10）社会消费需要和文化传统中崇俭反奢原则的冲突。

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冲突也就是两种文明的冲突。”

在这种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几乎是一边倒的讨论中，60 年代在台湾向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劣根性无情开火，并鼓吹“全盘西化”的两位学者的系统观点，通过某归国留学生的媒介，被不加

分析地引进了大陆,使“全盘西化”论的思潮又一次在中国时髦起来。他们认为“三百年来,朝代换了,古人死了,但是圣朝破邪的细菌没有消失,一代又一代,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中国人有“窝里斗”、“不习惯认错”、“精神浪费”、“容易膨胀”、“没有独立思考力”的“劣根性”,犯了“义和团”、“中胜于西”、“古已有之”、“中土流传”、“不得已”、“酸葡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挟外自重”、“大团圆”、“超越前进”等十一种“有代表性的病”,病因是“泛祖宗主义”、“浅尝辄止”、“和经济背景脱节”、“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等。因此,他们重申文化是“完全的整体”说法,认为学习西方文化,不能“取长补短,择善而从”,“要桤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得桤”。“西方现代文化,就好像一个美人,你若想占有她,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儿占有。我们一方面要人家的胡瓜、洋葱、番茄、钟表、眼镜、席梦思、预备军官制度,我们另一方面就得忍受梅毒、狐臭、酒吧、车祸、离婚、太保、大腿舞和摇滚而来的疯狂。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可是我们总该认请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我们的‘大目标’是建设现代化强国,在这个‘大目标’下,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的决绝与胸襟,‘大目标’是安慰我们,补偿我们最好的代价。在这个百年大计中如果真有‘损失’,也是值得一干的。”^①上面一番话,是到目前为止对“全盘西化”论表述得最透彻,最淋漓尽致的。《青年参考》理论版接连两期以整版篇幅加以刊登,宣传。方励之、王若望等人也就更加忘乎所以。1986年11月,方励之跑到同济大学讲话,公开声称“我是欣赏全盘西化这个观点的。所谓全面西化,我个人认为就是全方位的开放,从整体上讲我们的文化比世界先进文化要落后,不是一个方面的落后,而是全面落后”。叫嚷“中国现在主要不是引进机器,而是引进总理”。王若望

① 中国科大《研究生》增刊,1985年6月。

在上海鼓吹中国“前进的路可以说,就是运用资本主义,几乎是所有的管理、方法和社会条件和流通方法,包括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意识”。^①

上面列的事实,清楚地显示了最近这一次文化反思发展的历程。沿着这种偏激思维方式的轨迹前进,到1988年出现《河殇》及《河殇》热,达到民族虚无主义的极端,是必然的。《河殇》主要撰稿人苏晓康称赞“1988年是嚎叫的年代”。^②在这“嚎叫的年代”中,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撰写自己没有学过的一切东西,可以不需任何证明而大胆假设各种惊人的断语,可以放肆地咒骂象征中国文化的长城、黄河,否定自己的历史和现实的一切东西,而不受任何的惩罚。由于苏晓康等人“呼唤全民族反省意识”之自觉和强烈;又由于他们是通过电视这个媒介工具传播理论信息,而当时中国已是一个拥有上亿架电视机、六亿观众的电视大国。因此,这次文化反思已经冲破知识分子的圈子,卷入者几乎遍及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群众,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以往各次文化反思。一些青年人第一遍看《河殇》,感到中国太落后,非脱胎换骨不可;第二遍再看,认为中国没有希望,没有前途了,干什么都不来劲。这种消极悲观的情绪,在学潮中必然跳向另一极端,演变成盲目破坏一切的行动。因为是盲目的,缺乏理性的行为,就势必十分激烈,甚至带有一定的狂热性。这说明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力是很大的。但是,后来的事变进程表明鼓噪虚无主义者预期之目的并没有达到。1989年学潮迅速发展 to 动乱的严酷事实,起了惊醒的作用。它教育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这次文化反思发展到《河殇》热之后,就开始走上比较健康的轨道。可以预计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破产会比过去彻底一些。人们在痛定思痛之后,从50天反思开始,进而对这次文化反思、近代

① 《王若望在上海淞江县文化馆的演讲》,1986年10月。

② 《龙年的悲怆》,《文汇》月刊,1989.1。

中国的文化反思、乃至古代中国的文化反思作“反思”。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1978年开始的最近这一次文化反思并没有结束，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二）以洋为镜的中国近代文化反思， 出现民族虚无主义思想

可以明确地告诉读者，“文化反思”不是近代中国人的新发明。从“检讨”、“反省”、“省察”、“鉴戒”的意义上说，古代中国人早就不断进行“反思”，只是这种“反思”与近代“反思”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罢了。翻开中国古代史书，我们一眼便可看到下列事实：当一个封建旧王朝覆灭之后，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王朝的头几代皇帝及其大臣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对前王朝的兴盛与衰败作一番“反思”，从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前面王朝失败的惨重程度，将影响后继王朝“反思”的深度和广度；而“反思”的深度和广度，则将直接影响新王朝政绩的大小和寿命之长短。

回顾过去，可以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反思具有以下历史特点：它们产生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之下，目的是使新建王朝长治久安，万世不替；进行反思的成员，主要是新朝的帝王和上层士大夫；反思的内容，主要是总结前人治国安邦的经验和教训，以古为镜，以知兴替。反思中不存在中西文化对比的问题，更不存在“西化”、“全盘西化”的问题。那时的中国人认为自己处在天下的中心，皇帝则在中心的中心，更是至高无上。他们鄙称外国人是“夷人”（旧时指没有文化的人），不可能以“夷人”为榜样，进行对比“反思”。既然“反思”主要是以古为镜，从前面王朝兴替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就不会具有彻底反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色彩。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中，近现代比较集中的文化反思，除最近这一次以外，已先后出现过多次：

第一次文化反思,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主要学习西方的物质文化。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只是开始承认自己在枪炮、机器、技艺、练兵之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至于纲常名教、政治体制、伦理观念、礼仪风俗中国都还优于西方,不必学习。因此,这次文化反思只是从物质文化角度“以洋为镜”,得出的“师夷”之主张也仅仅限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的东西。这一次文化反思和学习西方,是由清朝政府开明士大夫和带有买办性质的地方官僚军阀势力主持,是迫不得已的,并非为全民族的振兴。又没有整体的规划和长远的打算。因而限制了反思的广度和深度。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方官僚军阀势力膨胀起来,这些官僚军阀通过办洋务,借助洋人、洋器、洋术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很少有富国强兵的真正愿望。封建的官僚体制使得因循、苟且、粉饰、夸张、蒙蔽、贪图安逸、惯于陈例等弊端滋生繁衍,干扰阻碍学习西方的实际进行。封建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把学习西方视为“与百姓无涉”,使得这次文化反思逃脱不了枯萎的厄运。更由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是在被外国侵略者打败后再勾结起来的条件下向侵略者学习的,所以处处显得惶栗被动,甚至一幅洋奴像,带着浓厚的封建性、依赖性、买办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学到西方真正先进的东西,充其量跟在别人后面爬行。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这次文化反思是发生在中国刚从古代进入近代的背景之下,就必然残留不少古代文化反思的特点。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出现了第二次文化反思,以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为主。如果说第一次文化反思尚不具有典型的近代文化反思特点的话,那么从第二次文化反思开始就是典型的近代文化反思了。这次文化反思是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剧烈的创痛之下,在对洋务运动的深刻批判中发生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变法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皮毛枝叶东西,是不能实现富强的根本大计的,强烈要求改弦更张,去陈用新,奋然改革,使政令从新。孙中山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则更是明确提出恢复中华,创立

民国的主张。可见，这次文化反思是从制度文化角度“以洋为镜”，已经不限于学习西方文明的表层东西了。方式是设新式学校，开报馆，创学会，成立立宪团体，建立革命组织，通过和平的和暴力的两条途径，迫使清朝封建统治者让步，以致最终交出政权。主持这次文化反思，推进向西方学习议会民主制度的，是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由于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环境里，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大势力的挤压，先天不足，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很软弱，易于动摇妥协，这就注定了他们从制度上学习西方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所以无论是维新变法，立宪运动，保路斗争，还是辛亥革命成立民国政府，不是昙花一现，就是羊头狗肉，有名无实。

第三次文化反思是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以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为主。这次文化反思是发生在辛亥革命流产的背景之下，从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开始的。民国建立，政权很快落入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和一帮反动官僚政客之手，共和只剩下一块招牌，社会黑暗甚于前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力图维护和挽救民主共和的革命果实，主要是集中力量继续从事军事斗争。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开始继承清末维新志士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的传统，从思想文化上探索形成这假共和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一次文化反思是从精神文化角度“以洋为镜”，学习西方立国的根本精神。学习的方式主要是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通过报刊和学校某些课程，以青年为基本对象，发动一场类似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启蒙运动。后人称之为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这次文化反思的范围，基本上局限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他们的目的是要启发国民的觉悟，而行动上却很少与国民直接接触，加上这次反思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这不仅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而且还走到与发起者初衷的相反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人羨

慕的“天堂”发生了大地震，“老师”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厮杀，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从物质、制度到精神，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寻找第三文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五四运动后，中国有了共产党。尽管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共产党的力量较弱小，还不能主宰中国之政局，但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它使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四次文化反思，发生在国民党统治的前期，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前后七、八年时间。围绕“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文化人中间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辩。这次文化反思是在国民党政府尊孔复古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国民党新军阀控制了全国政权后，它一方面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又抬出封建文化，麻痹人们的斗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1928年，它借修孔庙之机会，大搞尊孔祀孔。1934年2月，蒋介石亲自倡导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的新生活运动，给旧礼教披上了新外衣；4月，陈立夫主持成立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行《文化建设》杂志；8月，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政府五院以及内务部、教育部官员到曲阜祭孔；10月，考试院长发表鼓吹读经的谈话；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正式通过“尊孔祀圣”的决议。一时间，各地军阀，如广东陈济棠，山东韩复榘、湖南何键等南北呼应，也竞相演出“尊孔”闹剧，其中陈济棠最为卖力。这一切做法，显然与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时代精神是格格不入的。与此同时，内战延绵不断，外敌入侵日甚一日，社会黑暗现象有增无减。面对这严酷的现实，一些爱国的学者、教授、青年知识分子，思想极其痛苦郁闷。他们对于“清党清共以后”，德先生“不幸悴损了颜色”，宗法“立刻又抬起头来”，孔家店“重再开张”的局面十分不满。^①

① 谢扶雅：《新文化运动中的哲学思潮》，《学术论文集》第156页，广州思思学社，1929年5月。